

海外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研究综述

■ 谢素军 谢碧霞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635)

【摘要】海外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研究是一个小众领域,其从简单的青年运动观察逐渐上升到对中国共产党全球战略的思考。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海外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研究历经媒介观察、学界评价和政界热议三大阶段,每个阶段所关注青年工作的视角和内容皆有不同。尽管海外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研究具有明显的零散性和附属性,但总体而言仍然聚焦中国共产党与青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教育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服务四个方面。但是,这些研究和评价多以西方价值体系为评判标准,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础之上,有脱离实证调研的趋势,且热衷于关注中国青年发展中的极端个例问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青年工作 海外学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党管青年”原则,把“青年”放在“首先要发展”的重要位置,制定出台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等一系列标志性、引领性、关键性的青年发展政策,涵盖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就业创业、婚恋、健康、社会参与、权益保护等方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工作体系^①。与“西方青年之乱象”相比,近年来,中国青年爱国热情持续高涨,积极参与国家建设,青年组织凝聚青年、引领青年、服务青年效果显著,中国“青年可持续稳定发展”状况也逐步吸引了海外学者兴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青年工作的方式方法、组织途径等,这些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国青年以及青年工作、青年组织的重要窗口。

事实上,在建党初期,海外也有零散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的观察和评论,一些学者尝试对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进行观察、评价,寻找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确立、发展壮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青年工作之间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及实践逻辑,特别是从西方的视角来比较分析中西方政党开展青年工作的本质区别,并试图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青年工作将给世界带来何种启示与影响。在海外人士看来,中国共产党这些显性或隐性的青年工作理念及方式方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特色和规律。因此,海外学者对中国

收稿日期:2021-11-11

作者简介:谢素军,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广东财经大学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青年工作、国家治理;

谢碧霞,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青年政策、青年区域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0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立项重点课题“青年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协同共治模式研究”(课题编号:2020WT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广义上的青年工作对象包括在职青年、大学生、少先队等群体,本文将少先队工作等统一纳入“青年工作”的范畴。

共产党青年工作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他者”视角,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提升青年工作的成效,向国际社会更加充分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青年工作有一定的启发。

一、海外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研究的缘起及发展阶段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来已久。根据学者路克利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不久就逐渐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执政党,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开始兴起。20世纪50年代中期,海外学术界形成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海外对中国共产党呈现出日益关注的态势,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成为了海外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韩强提出,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分为党史和党建两大领域,其中对党建研究的关注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未来走向等议题^[2]。事实上,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青年始终是革命、建设、改革浪潮中的先锋力量,党自成立就高度重视青年,形成了科学的、一脉相承的青年工作思想,制定了符合青年发展实际的青年工作政策,青年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截至目前,海外学界把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列入专项研究议题的还比较少见,大部分是散见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党建内容上涉及关于青年工作的相关问题。

(一)研究缘起:从评价中国青年运动到解码中国青年精神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视,最初起源于20世纪初的青年运动。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青年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海外对中国青年的关注度显著提升,但主要以媒体记者和政客为主,主要关注中国青年大规模的运动是否会对当时中国的思想、政治、经济秩序形成冲击,以及冲击的力度有多大,是否会影响欧美国家在中国的利益等进行预测。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青年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即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将在多大程度上、多广范围上影响青年以及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外对中国青年运动研究的兴趣进一步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紧密结合在一起,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推翻三座大山、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有效地组织、发动青年群体这一有生力量是关键,而赢得青年群体的恰恰是中国共产党。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日益加深,在西方社会青年街头运动频发、对社会稳定持续发展带来较大挑战的形势下,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工作模式越发受到学者的关注,海外对党的青年工作研究逐步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成为海外洞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成为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视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论述中关于青年工作的内容进行梳理;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策、法规进行分析;三是对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各级教育内容和导向进行探讨;四是对中国青年的政治思潮及发展方向进行专题研究。

(二)研究历程:海外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研究的三个阶段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的研究总体呈现出由冷到热、由媒介到政界和学界、由“附带性”研究到专题化研究的趋势和特征,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20世纪上半叶:政治家及媒体的观察阶段

这一时期的中国内外交困、动荡不安,大规模的青年运动引起海外广泛的关注,当时在

华的英媒记者和作家,从惠特·宾纳(Witter Bynner)和乔治·索科夫斯基(George Sokolsky)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后来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们所写的一些报道和文章中都称赞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运动,认为它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赋予希望的、脱离愚昧的觉醒。时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及政治科学家芮恩施说,他相信中国青年们是在为他们的民族自由和新生而战^[3]。20世纪初,中国青年在文化、思想上的觉醒及为维护民族尊严所采取的集体行动,受到了西方观察者的关注。但对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谁,虽然日本政府指责布尔什维克煽动了这场运动,但当时的知识分子领导者、许多外国观察家和外交官都否认了这一点^[4]。1931年,《纽约时报》刊发评论“九一八”事变,“东京正在谴责中国年轻人在挑起事端,如果不是因为铁路被炸毁,关东军是不会在沈阳发起军事进攻的”^[5]。这些错误言论报道中国青年的行为,一度误导了美国民众对战争真相的认识。1938年7月,瑞士摄影记者沃尔特·博斯哈德奔赴延安后连续刊发了8篇有关报道,对中国共产党引导青年工作、铸造青年精神进行了高度评价^①。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描述,有一节专门描述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少先队工作,记录了红军中的少年先锋队队员,他在书中写道:他们总是愉快而乐观,不管整天行军的疲乏,一碰到人问他们好不好就回答“好!”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6]。作家拉奇曼指出,“《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全世界刻画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描述了中国青年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7]。1940年,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在《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后方”章节的描述折射了在抗日的另一个战场,中国共产党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凝聚青年生力军,这是中国赢得胜利的重要力量^[8]。1944年6月,西方媒体发起的“延安考察记者团”抵达延安,包括北美联合通讯社、《纽约时报》《芝加哥日报》《生活》杂志、《纽约先驱论坛报》等媒体记者,他们争相把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发回国内媒体,其中青年是重要的图景之一^[9]。可以说,这个阶段海外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研究还是观察式的描述。

2. 20世纪下半叶:理论性、专业性研究的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改革开放后,积极鼓励青年解放思想、创新创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不断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成为海外学界研究的热点,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内容、青年组织的形式、青年发展的方向等问题开始进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题中。1967年,鲍大可(A.Doak Barnett)的代表作《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与政权》从官僚视角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策,以及在既有体制下探索青年发展的路径。1988年,麦克·奥森伯格撰写的《中国的政策制定:领导、结构和进程》尝试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组织化下的青年工作进行探讨,认为中国青年思想受经济发展影响,开始走向多元。1992年在中国出版的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各卷皆由海外知名学者主编,卷内各章节亦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并注意吸收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海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且可以从书中找到具有一定专业性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相关领导层对青年工作的一些观点和对话。2007年,日本学者泉谷阳子的《中国建国初期的政治与经济:群众运动与社会主义体制》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展青年群众工作的方法、路径和机制。此外,2007年,美国学者毕克韦等著《对中国的干扰:反官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失败》及2008年由加拿大的杰里米·布朗所写的《胜利的困难:早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对中国共产党

^① 1938年,瑞士记者沃尔特·博斯哈德深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亲自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拍摄了名为《通往延安之旅》的黑白无声纪录片,并撰写了大量的报道。

的青年工作进行了探讨。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学者关注点相对分散,但对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评价比较客观。

3. 21世纪初至今:政界热议阶段

进入21世纪,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中国全面、深度地参与国际事务,海外再度掀起“中国学”的热潮,青年工作作为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也受到了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大批政治、学术双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进行了关注和讨论。2012年在中国出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论中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对中国的政治哲学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同中国领导人的对话中折射出对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远见^[10]。罗伯特·库恩在所著的《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一书中,对中国领导人关于青年发展的思维进行解读,并认为中国青年将影响世界未来^[11]。这个时期,海外特别关注中国发展背后的原因,并开始回过头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治国理政的方法论。在《毛式经济学:为什么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经营的资本主义比我们好》中,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模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推动青年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12]。在《探索中国发展模式:超越北京共识》一书中,作者通过分析中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法律因素外,提及了青年是重要的社会因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策^[13]。在《美国能向中国学习什么》一书中,作者对青年在政治体制中的发展路径及发展规划给予了较高评价,并批评了美国政党对青年发展工作的不足^[14]。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海外学界、政界对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研究尽管仍然是在大的中国研究体系中的“点缀”,但却明显向集中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海外各界越来越重视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而青年工作是重要组成部分。

二、海外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研究的主题

在海外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研究领域,无论是媒界、政界还是学界的研究内容和方向,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关系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青年群体是一种什么关系,海外学者一直存在争论。西方国家大多数是通过在政府部门中设立青年工作机构,或者直接成立青年工作部来实现执政党与青年的互动,但中国共产党与青年的联系纽带主要是借助共青团,共青团是党的助手与后备军,是协助党专门开展青年工作的群团组织。不同于西方国家青年工作以项目为单位、具有临时性特征、常常因财务预算的调整而变化,中国共青团的青年工作有清晰的目标、完整的体系,在工作内容和方法上有严格的遵循,即便是青年工作项目的开展也具有持续性特征。“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工作方面的突出优势,首先必须认识共青团的功能作用,其为前者提供后备军,本质上是否可以称之为代理人?”大卫在《培训中国的政治精英:党校系统》一书中描述中国共产党开展青年工作的方法时强调,共青团和共产党几乎是同一历史时期产生,他们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父子抑或兄弟并不重要,关键是共青团正在充当共产党的代理人角色,这种角色较之西方的青年工作部门有着无可比拟的政治优势^[15]。也有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关系的分层分类特征,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青年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在不断选拔优秀的人才“为我所用”,例如,托尼批评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模式带来了必然的青年阶层分化,这种分化带来了青年离散的危机^[16]。此外,还有些学者从公共资源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与青年的关系,特别是臆断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资源上占据绝对的控制权,青年群体不得不依附于绝对权威,这种依附关系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的发展关系。这些都为中

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其不好的评价和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青年政策

中国共产党重要政策制度的出台几乎都会引起海外媒体的热议,但事实上,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直至2017年《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出台,中国共产党推动青年发展、维护青年权益的政策制度大都嵌入在有关经济、社会、文化等重要领域的政策当中。所以,无论是媒介还是政界和学界,海外对中国共产党青年政策的讨论虽然放在重要的位置,但却显得有些零散,归纳起来大概涵括两个层面:一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策比较落后,无论是专业性还是覆盖面都无法与西方国家比拟。例如,美国学者沈大伟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特别撰写了“重塑意识形态”的章节,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青年政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隐蔽性论调引起不少西方学者的共鸣,同时指出中国青年政策还处于建设和完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青年领域专门性政策法规制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较滞后的问题^[17]。二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政策在事实上已经转化为具体的青年工作,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布鲁金斯学会鲍大可等,他们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展青年工作的枢纽是共青团,各级共青团根据各地工作实际,不断在创新实践各类工作项目,这些项目、方案乃至制度的实施本质上是西方国家的青年工作政策,只不过从规范性和连贯性方面有所缺陷而已^[18]。严格来说,这两个维度都有其片面性,没有将中国共产党开展青年工作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观察和研究。

(三)中国共产党青年教育

青年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青年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海外自关注中国共产党起便特别注重对中国青年教育模式的分析,但与国内学者多将中西方教育进行比较不同,海外学者更执着于中国共产党青年教育的影响力分析。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青少年教育体制的评价,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青少年教育的基本框架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特别融合了英国、日本等国家一些先进经验,同时受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模式的影响,总体评价较为正面。如亨利·莱文(Henry M. Levin)认为,“中国青少年教育正在全面走向现代化,尽管在科技方面与西方国家尚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是一个超级人口大国,中国共产党推行的义务教育为全球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

第二,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在青少年教育中强化民族传统文化的相关政策或措施进行评价,认为中国共产党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大之后,开始转变教育战略,传统文化的注入是青少年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客观地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措施、经验与西方教育进行了比较,在《中外比较教育史》中直言不讳,青少年教育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战略主攻的要害,很明显,中国共产党感受到了危机,但传统的教育模式、内容与方法并不能化解危机,某种教育一旦形成,很难再拒绝^[20]。不过,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强化民族文化的教育理念更多的是客观看待。费丽莫批评西方国家对待中国青少年教育有失偏颇,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传承传统优秀文化,而且大多数国家一直在这么做,中国共产党对青少年教育的引导完全可以理解^[21]。

第三,则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在海外投资建设教育机构、学校,特别是对孔子学院的蓬勃发展进行讨论。这一方面的评价总体趋于感性,不够客观,且多以政客、媒介的宣传为主,认为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影响力正在壮大,而孔子学院等教育机构本质上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如美国前总统的特朗普就将孔子学院作为政治攻击对象,大肆渲染政治危机。无论是哪个方面,海外对中国共产党青少年教育政策总体缺乏了解,大多基于自身文化经验,难以真

正做到客观、完整地评价。

(四)中国共产党青年服务

在海外学者看来,做好青年服务是一个政党能够生存、发展、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前提之一。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年风雨,青年始终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发挥先锋队和生力军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经济发展,青年思想愈发多元化,青年的诉求也日益多样,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做好青年服务工作的,其中的方法论有什么特别之处,海外学者对这一方面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首先是对青年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关注,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指出,中国的社会治理正在形成越来越完善的解决方案,它取决于党和人民的关系,青年是其中的重要元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秩序和方向^[22]。但大多数海外学者更倾向于对服务内容的论述,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青年服务项目出发点很简单,即解决问题,但这种方法有时候会顾此失彼,因为青年发展带来的问题并非同质,而是因群体和环境的变化而不同,“灭火式”的工作方式显然过于被动。2016年广州青联代表团在《赴英国考察学习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有部分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对青年服务项目进行顶层设计,不仅仅是针对中国青年的发展诉求,更加在面向世界青年发展的道路上进行积极的制度设计和项目实施。还有一些政客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开展青年服务的目的,强调所有的项目、内容最终的目标在于服务政党政治,甚至指责中国共产党开展的青年服务工作在于安抚青年群体,防止青年运动的爆发。总体而言,海外所聚焦的中国共产党青年服务维度的研究还处于点到为止的层面,且常常将之与意识形态挂钩,从西方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难免会产生扭曲和误解,也同样缺乏系统全面的调查。

三、对海外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研究的评价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BBC、CNN等多家外媒都对此进行了密集报道,庆祝活动开始后此类报道更是在外媒上连续刷屏,例如,法新社在推特上十几分钟内密集推送了4条当天活动的现场直击,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再次掀起了一波浪潮,旨在将中国共产党进行全方位抽丝剥茧式分析。在这些专业化的研究领域中,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是一个非常小的细分领域,但却是最有价值的研究构成之一。回顾百余年来海外对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研究史,总体呈现出四个明显特征。

其一,始终以西方价值体系为评判标准。无论是评价中国青年运动本身,还是对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内容和成效进行分析,以欧美国家为主的海外学者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建立在西方价值体系之上,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只在共同价值的方向上可以看到有限的客观内容,如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斗中引导中国青年所作出的努力基本上符合事实。但当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触碰到西方价值脆弱的环节时,则会遭到不公平的抨击,完全失去研究的客观性。如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世界青年交流项目发展中所涉及的青年共同发展内容,很难得到西方学界、特别是政界客观的分析评判。但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中国发展的实践超越了西方制度决定论的解释范畴,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摒弃过去单纯从“政治体制”的视角观察中国发展的研究路径,愈发认识到应深入到治理实践中去探寻中国成功的密码^[23]。

其二,利益成为影响研究解读方向的重要因素。任何政策、项目、举措的落地实施,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解读,完全可以形成截然不同的意思。海外学者在解读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时,有褒有贬,有大篇幅就事论事,也有指左而言右。这些研究者大多会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对

不利因素进行抨击,对有利内容进行赞许和倡导,具有明显的利益导向。如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以中国留学生赴美国为例,美国本土学者和政客既期待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实验室和企业服务,为美国科技事业作出贡献,但又批评中国留学生“窃取”了美国的核心利益,这种矛盾的心理和姿态本质上就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不过,也有部分研究者会比较客观地从全球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读,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工作领域所作出的努力值得肯定,不应该用狭隘的眼光看待日益开放的中国。

其三,主观臆断逐渐凌驾于实证调研之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欧美为主的海外国家对中国的报道尚且重视实证调研,多次派出观察团、媒体团赴延安、上海等地进行零距离访谈,尽管这些访谈资料有限,但却凸显了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相关研究和评论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可惜,这种科学调研的传统正在削弱,特别是近年来,依据新闻媒介乃至个别记者捏造的事实进行评判几乎已经成为西方政界和媒体的通病。如英国媒体对新疆青年“阴间滤镜”式研究和报道便是典型的恶意捏造、主观臆断。一些连中国土地都未曾踏足的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评论更是毫无根据、不堪一击。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特别是青年工作研究亟须从方法论上进行纠正。

其四,热衷于关注青年工作中的极端个例问题。青年工作作为一个跨领域的整体性事务,青年事务的多元性、跨界性,导致青年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全部解决。但部分海外学者在探讨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效果时,却喜欢将极端个例问题扩大化,将个别案例放大为普遍性问题来分析和报道,甚至有些政客利用小部分青年出现的问题或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西方媒体对部分香港青年非法集会的分析和评论便是典型的案例。为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抹黑和攻击,海外有些研究和报道完全失去公正和客观性,如同对2021年初美国国会受冲击事件的分析,整个海外媒介的分析一边倒地偏向于美国当局,对比之下充分体现了海外某些国家利用中国个别的青年问题在做政治文章。

当然,作为对海外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研究的回顾,也需认识到一个客观事实,大多数海外学者其实具有很好的科学精神,但毕竟身处异域,难以全面掌握客观、真实的材料,更难以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真正运作逻辑,这些导致其研究难免出现先入为主的情况。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党的青年工作的国际宣传与传播,在青年工作领域要叙述好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24],加快中国话语特别是青年话语的国际转换,解决好青年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冲突,构建适应国际发展的青年话语体系,让海外更好地认识、理解我们党的青年工作,了解中国青年发展的远景和目标,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地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争取窗口周期,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青年声音^[25]。

总体而言,随着中国深化改革的推进,党的青年工作也在不断改革中走向成熟与完善,海外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正在从零碎走向集中、从业余走向专业。所以,对于国内党史研究和青年研究而言,掌握海外研究动向能够从跨文化的角度丰富我们自身对党的青年工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根据海外研究的进展探索与国际研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这既有利于海外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研究水平的提升,也有利于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更加精准把握研究和建设的方向与重点。在国际视野下审视我们党的青年工作,对实现党的青年工作体系创新、更好地把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青年生力军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路克利:《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

[2] 张清俐:《积极引导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http://sky.cssn.cn/mkszy/kxshzy/201705/t20170502_3504991.shtml

- [3][4]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95页。
- [5]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1931,front page.
- [6]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王涛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90页。
- [7] 武际良:《斯诺传奇》,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 [8]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陈瑶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180页。
- [9] 沈琦:《外国记者在中国》,载《中国新闻学会年刊》,1942年第1期。
- [10]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132页。
- [11] Robert Lawrence Kuhn.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Wiley, 2009, p.450.
- [12] Sebastian Heilmann, Elizabeth Perry.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p.112.
- [13] S. Philip Hsu, Yu - Shan Wu, Suisheng Zhao.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 Routledge, 2014, p.443.
- [14] 李涪:《美国能向中国学习什么》,章晓英译,北京:红旗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 [15] 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2008, (195).
- [16] Tony Saich.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M.E. Sharpe, 1996, pp.229-232.
- [17] 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 王新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页。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20页。
- [19] 亨利·莱文:《高科技、效益、筹资与改革:教育决策与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曾满超等编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 [20] 许美德:《中外比较教育史》,朱维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5页。
- [21] 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 [22] 马丁·阿尔布劳:《中国新型治理超越西式民主》,载《参考消息》,2020年1月3日。
- [23] 付正:《海外视域下的中国治理研究》,载《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4期。
- [24] 郑永年 杨丽君:《如何叙述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载《青年探索》,2021年第4期。
- [25] 谢素军:《构建青年学的青年话语体系》,载《北京青年研究》,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张 丹)